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历史理论

■ 卢燕

马克思生于 1818 年 5 月 5 日, 当此诞辰 200 周年之际, 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遍及世界各地, 包括学术界的多不胜数的研讨会。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是围绕解释历史、改变世界展开的, 其核心是政治经济学, 而伦敦又是《资本论》的诞生地。所以, 笔者拟在这篇短文中略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这对非专业读者可能是过于晦涩, 不过, 基于话题的现实重要性, 还是期望能起到一点深化认识的作用。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

4 月下旬, 美国经济学家 Samuel Bowles 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网站 VOX 为文, 从当代经济学视角评价马克思。文章开篇这样说: “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及格, 对此, 今日的经济学家少有怀疑, 而他们这个态度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负面判断上的。”

话里话外, 这个开场白意味深长。

首先, Bowles 这篇评论文章本意其实是要为马克思正名, 核心论题是将马克思理论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 在不同层面上充满预见地阐释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显学。

其次, 在微观经济学之外, Bowles 对马克思经济学其实是偏于否定的, 他尤其是认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父)和萨缪尔森(新古典经济学在战后的集大成者)的判断, 认为劳动价值论作为关于价格和分配的普遍均衡理论是不合格的。

经济学中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 其实可能有两种不同涵义。一是从研究对象着眼(这符合日常话语对“经济学”的理解), 关于现实上的微观和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此而言, 说马克思经济学有微观理论, 包括劳动过程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垄断与竞争理论等等, 这应该没错。二是从特定的知识设定着眼(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独创), 所谓“微观基础论”主导了现代经济学的相关文献, 意即没有“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作为基础的理论都是形迹可疑的。就此而言, 不仅马克思理论被视为不及格, 连凯恩斯本人的论著和后凯恩斯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等等也都不获认可。

这样, Bowles 及其同道者所致力, 要发展出一套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经济学, 这在上述第一个层面上有意义也有贡献, 在更根本的第二个层面上则很有问题。去掉了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劳动压榨理论与新古典的劳动偷懒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等, 还能有什么区别? 如果回答说没有区别, 就解释历史而言, 这是贬低而非抬高了马克思理论, 纵使将它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也没用。

整体性理论不等于宏观经济学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本意其实不在于解释价格和分配, 而是要作为基础理论, 阐释资本主义(更准确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生产逻辑或运动规律, 即是阐释从价值的生产和榨取到资本积累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演化和后果。

在这个理论中, 微观经济主体和关系的结构、组织、行为、绩效等等, 都是体现着整体性的运动规律, 与宏观上的劳资分配比例、消费与投资的消长、商品扩张与金融化、繁荣与危机的交替等等, 应该是同一过程。就 Bowles 的论题而言, 劳动过程无疑涉及权力与控制问题, 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和企业理论确实有相通之处, 然而马克思理论的特殊性在于强调权力、控制是为了应对由技术和社会双重决定的整体性强制(要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 这就与劳动

偷懒理论截然分开了。

由此引申,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再生产图式, 表面看起来是宏观理论, 是关于社会再生产能够进行下去(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下去)所需的条件的理论, 实际上其基础是资本循环, 同一过程也就贯串到微观层面。资本循环, 如果是依靠商品扩张的话, 势必涉及劳动压榨问题, 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对于生产率的过度压榨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或压榨不足导致利润率下降等问题, 都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困难。而如果资本循环是依靠金融扩张, 则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势必成为常态, 从金融危机蔓延至经济危机, 同样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困难。

然而这些“如果”及其后果并非偶然, 而是内在于系统性的资本积累过程, 这是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的主题。正是这个主题将马克思与主流宏观经济学区分开来, 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 后者始终是倾向于将社会再生产持续下去视作常态、将经济危机视作仅是波动而已。从马克思理论得出的判断是, 强化劳动压榨是资本应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典型手段, 而资本逃避生产、沉溺于投机则是这个趋势往往导致的局面, 其结果始终是系统性资本积累的断裂, 以及社

会灾难和反抗。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历史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解释历史的理论, 其建构起点是对历史的抽象, 由此形成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理论,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作为总结。与此对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公理、假设演绎出来的理论, 所谓“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是只有个人、没有社会, 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社会契约论, 其建构起来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其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理想梦想, 即是认为到了资本主义就“历史终结”。

这样看来, 就解释历史而言, 马克思经济学的建构起点应该是比新古典经济学合理。然而这种合理性并不必然构成理论的优越性, 毕竟, 马克思所建构的是一个关于抽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资本一般”), 而不是直接再现历史。

这里的问题是: 理论上呈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与历史上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 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马克思原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 承接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将是关于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系统探讨和阐释, 然而这个后续任务

却因为他的逝世而来不及展开, 只能留给他 的继承者。而继承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 应该能够得到指引以面对这个任务, 这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探讨。

一、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整体, 那么, 研究对象就必须是整个体系的资本主义、存在于世界范围的历史资本主义。这样, 对特定社会的资本主义动力、演化和后果的研究, 起点只能是先澄清该社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定位置, 包括被卷入体系的过程和方式。由此引申, 既然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扩展是一个逐步进程, 则在世界范围上存在着体系的核心和外围区域的演化, 这不仅是历史呈现出来的面貌, 而且也是理论逻辑的必然。

二、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成为主导的社会中, 其持续下去所需的条件也不一定必然存在, 始终还是由技术和社会双重决定。例如, 作为基础条件的系统的商品化劳动力能否持续存在, 这没有必然规律, 而是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由此引申, 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定社会, 特别是在外围区域中, 是否就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 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是否主导和普及, 这也是并没有必然规律。

三、然而, 只要是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 则无论哪个社会都必然得面对这个体系的运作逻辑的强制。所谓强制, 如果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和普及, 那应该是什么? 答案始终只能是系统性的资本积累, 毕竟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特性, 无论是总量资本还是部分资本, 其运作都是以以此为核心。

由此引申, 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和扩展, 或许在历史长时段中确实是以剩余价值生产和榨取为基础, 但也往往有可能是依赖其他性质的剩余生产和榨取, 包括奴隶、农奴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也包括掠夺外围区域以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 甚至包括榨取那些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剩余(例如今日中国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盘剥)。

针对以上三点以至更广泛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探讨, 就解释历史、改变世界而言, 应该是马克思的继承者的必然使命。至于无视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 无视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的绝对主导地位, 认为特定社会能否成为资本主义(或超越资本主义)只是取决于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 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或超越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模式, 让社会内部的主导政治力量自由地可选可不选, 这应该是跟马克思理论的本意相去甚远吧。

的失业只不过是工作转换所导致的心理成本作祟。原本在华尔街体面工作, 拿着不菲的收入, 现在可能需要在 一个没那么高大上的领域上班, 心理上无法接受。对阿尔法狗的抱怨并非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 可能更多地是增加了在位人员的心理成本。

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威廉姆森, 是诺奖得主, 发明了一个词叫“资产专用性”, 这个词的 意义在于把劳动分工的含义进一步深化了。过去我们讲劳动分工, 都是讲专业化的好处与坏处, 威廉姆森却说, 专业化的好处是因为资产的专用性导致的。当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工作多年, 长期从事某一个工作, 积累了丰厚的人力资本, 这是专业化所带来的高效率的基石。但专用性又会让这些人面临工作转换的风险, 一旦这些岗位过时了, 想换别的工作, 原先积累的人力资本就可能大幅度贬值。资产专用性增加了工作转换的难度。农村里农活之间替代性强, 专用性程度低。而大工业劳动分工细致, 专业化程度高, 资产专用性程度就高。从而在大工业时代,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就会大很多。也许在大工业时代, 面对技术进步这一必然趋势的时候, 学得多个技能是有必要的。或者说不断通过学习积累通用知识, 也许可以有效降低工作转换的成本。

史评论(EHR), 作为一本经济与社会史期刊(其他两本杂志为纯经济史期刊), 它的合著论文数量最少。因此, 是不是由此可以说社会史学者比经济史学者更倾向于独自研究, 而不是合作研究?

于是, 作者按是否有正规数理经济模型或是否有计量实证分析, 以及引用经济学期刊的文章数量, 将发表在 2003 年至 2011 年期间经济史评论(EHR)上的合著论文, 划分为经济学性质或历史学性质的文章。结果令人惊奇的是, 经济史并不比社会史有更多的合作, 经济类文章独著的比例更大。经济史评论上较少的合著文章数量, 可能是因为这本杂志的用稿传统, 或是其他。

作者通过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各自的顶尖期刊文章, 展示了当前经济史学者合作研究的程度, 落后于经济学者们, 但也是在提高中。在未来, 作者将进一步对比经济史与经济学研究方式的差异, 更充分解释本文发现的结果。(宗永)

技术进步下的就业焦虑

■ 周业安

我小时候生活的农村靠种田为生, 种田需要人力, 也需要物力。其中耕牛就是最重要的物资。对过去的农村家庭来说, 耕牛是仅次于房子的财产。没有耕牛, 田地就很难打理, 耕牛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因此, 把耕牛看作是一种技术进步并不为过。耕牛是宝贝, 需要好好看护。所以, 过去农村家庭都会有专人放牛。后来开始了农业机械化, 大片的耕地使用拖拉机更划算, 拖拉机耕作效率更高, 并且还不需要太费人力。于是一些家庭就联合起来共同购置一台小型拖拉机, 用于日常田地耕作。有了拖拉机, 当然就不需要有专人放牛了。可以说把人力从养牛这个活动中释放了出来,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这正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

为何在过去的农村, 拖拉机替代耕牛时, 家庭并没有认为出现失业? 这是因为当原先养牛的劳力被释放出来后, 多出的时间可以干别的农活, 这就意味着工作发生了转换, 或者说工作的替代顺利实现。只要能够做到工作顺利转换, 技术进步就不会导致失业。所以, 失业的产生并不是技术进步必然的结果。那种把失业与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的看法有点流于表面了。问题的关键在工作转换, 而不是

在技术进步。可能会有人质疑说, 农活技术含量低, 工作转换成本就低。

在工业社会, 不同工种的技术含量不同, 当劳动分工水平上升时, 工人的人力资本会被锁定在某些工作环节上, 导致工作转换成本非常高。这是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的很重要原因。

以前机械厂里都是小车床, 干活特别辛苦, 但也容易出技术活。做得好的人特牛, 做的零部件的质量和数量都要比一般人高很多。开这种小车床不需要太多文化知识, 只要肯吃苦, 勤加练习, 都能提高技术水平。但工人技术水平再高, 受制于小车床本身的局限, 工作效率还是很有限的。所以, 后来这些工厂就慢慢引进了数控机床, 从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 一个数控机床顶过去好多台小车床, 做出的活又快又好, 对人工的要求还少。这个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开小车床了, 多余的人面临没事干的难题。和农活不同的是, 此时工人的工作转换成本很高, 小车床开得好, 玩数控机床未必行。机器的智能化水平越高, 对工人的知识水平要求就越高, 对低人力资本水

平的人的需求就越低。这就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失业。

但仔细想想, 这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失业似乎也不是必然的。首先, 这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原因在于, 当技术进步发生时, 一部分工人失去了工作, 可以通过自身的学习, 重新获得更高水平的文化技能, 从而可以驾驭新的机器设备。学习能够降低工作转换成本, 这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看可能会出现失业, 长期看只要存在学习机制, 这种失业就会被弱化。其次, 技术进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并非静止的。当技术进步发生时, 工厂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在位工人的收入随之提高, 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更多样化, 此时, 技术进步会产生溢出效应, 体现在新的需求和新的工作创造上, 从而原先短期失业的工人同样可以转换到新的岗位上, 实现再就业。这种新工作机会的创造同样也会弱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失业问题。

因此, 在现实的社会当中, 当我们看到技术不断进步时, 失业率并没有随之线性地增长, 原因在于学习机制和新工作机会的创

造。

当然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原先工厂的待遇不错, 如果工作转换需要离开工厂, 就会失去这种待遇, 成本收益的考量会增加工作转换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不仅包含隐形的福利, 还包含体面、氛围、宽松、熟练和认同等。人们习惯于在老环境下工作和生活, 就是因为老环境下心理成本低。新环境需要重新适应, 充满不确定性, 有确定性偏见的人, 就不愿意转换工作。很多时候, 这种转换激励的缺乏并非出于懒惰, 而是出于心理成本。在看待工作转换这个问题上, 我们往往只在意物质的成本, 忽略了心理成本, 从而低估了工作转换的难度。

前几年阿尔法狗的出现让全球金融市场的从业人员很惊恐。这是因为阿尔法狗足以替代金融市场上的很多岗位, 从而至少在短期内会导致金融市场上的就业需求下降, 产生失业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一部分人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而失去了工作。问题在于, 金融市场上的从业人员都受过良好教育, 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 也不缺乏学习能力, 所谓

更广泛?

2003 年至 2011 年, 三本顶尖经济史期刊上发表有双作者的文章共 66 篇, 能够获得两位作者确切年龄的有 63 篇。44%的合作者年龄差距小于 10 岁, 同样大于 15 岁的也占 44%, 平均年龄差距大致在 13 岁(见表 3 第 2 列)。作者在 2013 年, 统计过三大经济史期刊上, 同期双作者文章的合作者年龄差距, 平均小于 8 岁。

可见, 经济史研究的合作者年龄差距, 是显著大于经济学研究的合作者的。究其原因, 作者归为以下两点。一是经济史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老少配的模式, 年长研究者的优势在于掌握史料, 年少者的优势在于更新的研究技术。二是经济史界的人数较经济学界要少得多, 找到同领域合作者的机会更少, 导致合作者之间的年龄跨度更大。

最后, 作者接着一开始提到的经济史学科性质, 继续深入讨论在偏历史和偏经济的经济史期刊上, 合著与独著的数量情形。经济

独著还是合著？经济史学圈与经济学圈大比拼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 学者合作撰写论文成为经济学界的潮流。这一趋势越演越烈, 如今在国外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上, 合著论文发表的数量早已超越了独著论文的数量。国内经济圈的情况亦然, 两大顶尖期刊《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2018 年 1 月至 4 月刊发的文章显示, 独著论文的合计数量仅为 4 篇和 8 篇。

那么, 经济史的研究者是否也纷纷效仿经济学家, 开始合作撰写论文呢? Selzer 和 Hamermesh(2018)考察了近 60 年来, 发表在经济史和经济史领域顶级期刊的文章。研究发现, 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 更多的合作是共同趋势, 但是两者的合作类型却存在显著的差异。

经济史学家的典型形象, 是独自整理史料, 孤军奋战, 几乎不与他人合作。据说, 经济史协会是会拒绝给合作论文颁发最佳新学者论文奖的。因此, 作者要将坊间对经济史学家的成见以及传闻, 与他们发表在经济史期刊

杂志上的文章, 做一次印证考察。

作者选取的三大顶尖经济史期刊, 分别是: 经济史评论(E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经济史研究(EE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杂志(JE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经济学的三大期刊, 分别是: 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经济季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作者以 10 年为期(分别选取 1963、1973、1983、1993 年和 2011 年), 收集发表在以上 6 本期刊的论文作者信息。

首先, 过去 60 年里, 独著与合著论文在经济史和经济史学顶尖期刊上的分布如何? 结果证明, 关于经济史学家的传闻不是空穴来风。经济史期刊上论文的平均作者数, 均低于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平均作者数。

然而,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经济史学者也悄然走向合作之路, 尽管步伐没有经济学家迈得快。1963 年, 合著论文在经济史期刊上寥

寥无几, 到了 2011 年, 独著论文已经不到一半, 相当于 1993 年经济学期刊上的比重。另一个现象是, 近 30 年来, 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的经济史文章显示, 合作情况优于其在经济史期刊上的情况, 劣于同期刊的经济学文章。

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 不同的经济史期刊在内容上会有所偏重。为此, 作者将三个顶级经济史期刊分开来看, 发现最注重量化分析的经济史期刊(EEH), 拥有更多的合著论文; 相反, 量化分析文章最少的经济史期刊(EHR), 则拥有最少的合著论文。但在过去的 60 年里, 一致的是, 这三个期刊中的合作者数量都呈相同的增长趋势。

其次, 经济史学者合作现象的增加, 到底代表着他们研究方式的哪些部分呢? 经济史的研究与经济学的研究有区别, 需要一些不同的技能, 例如, 长年累月的史料积累; 同时我们还看到, 经济史学者的学术产量远低于经济学家, 所以两者合作的方式可能存在差异。例如, 师徒合作的形式在经济史研究领域